

# 林语堂社会文化创译一体的跨文化书写研究

## ——以《吾国与吾民》的修辞转化为例

赵妍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摘要】**：本文以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创译一体”理念在社会文化跨语境传播中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林语堂通过比喻修辞的具象转码、对照修辞的差异化协商、幽默与互文修辞的柔性解构，成功将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家庭伦理等抽象社会文化符号转化为西方认知框架内的可读性叙事。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译学的“忠实”桎梏，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外译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启示。

**【关键词】**：创译一体；社会文化；《吾国与吾民》

DOI:10.12417/2982-3846.26.02.053

### 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文化碰撞中，中国社会文化的外译面临“文化折扣”困境，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仍受制于“东方主义”框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经典文本，不仅展现了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洞察，更通过“创译一体”构建了一套高效的传播路径。本文旨在解析林语堂如何通过意象转码、对话协商等方式，在保留文化本真性的同时实现跨文化适配，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范本。

### 2 创译一体的跨文化书写

#### 2.1 理论内核：创译一体

“林语堂的创作与翻译界限模糊，相互交织杂糅，译中有创、创中有译，形成了创译一体的特殊风格。”（冯智强、庞秀成，2018：1）“创译一体”的本质是翻译的艺术再造论，主张译者以“文化解释者”身份对源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林语堂的作品中，创作与翻译界限模糊、相互交织，形成了“译中有创、创中有译”的特殊风格。这种独特性源于其“双语精英”的文化身份，使其能在中西文化间实现“创造性中介”作用。

#### 2.2 实践向度：跨文化书写

跨文化书写的本质是破解社会文化符号的“不可译性”。林语堂通过修辞策略在文化差异与认知共性之间搭建桥梁，既规避机械直译导致的“文化休克”，又避免过度归化引发的“文化失真”。

### 3 社会文化的修辞创译路径

#### 3.1 比喻修辞的意象转码

##### 3.1.1 自然意象的具象再生

林语堂通过自然界的现象来阐释文化特征。例如，他将中国艺术中的女性美与“自然界的调和形象”相联系（Borrows its beauty from the rhythms of nature），成功实现了跨文化书写与传播。这一比喻还揭示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女娲造人”“大地之母”等神话原型形成呼应。通过将女性美与

自然界的调和形象相联系，在中西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既对比了西方艺术以人体为中心的审美传统，又通过普遍性的自然语境降低了西方读者的认知门槛。

#### 3.1.2 文化符号的类比转译

林语堂擅长借用目标文化符号解释源文化概念。如将中文的“侠义”与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chivalry）并置，同时引用《水浒》中的盗匪形象丰富其文化内涵。此策略本质是符号转译，即借用目标文化中的既有符号（chivalry）解释源文化的独特概念（侠义），既避免文化失真，又激活读者的前理解。这一过程符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林语堂作为编码者，通过符号对等实现“偏好式解码”，引导西方读者将“侠义”纳入自身文化经验中的“正义”范畴。

#### 3.2 对照修辞的创译协商

##### 3.2.1 中西价值的调和共生

中西文化镜像对照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凸显文化的独特性。林语堂将中国婚姻视为注重社会功能的“家庭事务”，而将西方婚姻视为强调个人自由的“情感事务”。这种对照不仅揭示了中西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根本差异，还深刻反映了两种文化背后的价值观：中国倾向于集体主义，注重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西方则倾向于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情感需求与自由选择。差异对比引发读者反思自身文化逻辑，而共性揭示则促成文化认同。此策略既凸显独特性吸引注意，又通过共性减少排斥。

##### 3.2.2 古今精神的递进重构

林语堂以《论语》回译（“知天命”“耳顺”）构建传统锚点，继而将儒家修身观升华为现代民族性格基因。此过程既通过中西术语置换凸显文化独特性，更借古今价值转译使传统智慧获得重构现实意义的历史纵深，达成“创译一体”的本质：使孔子言论成为解读中国精神的活态密码。

### 3.3 幽默修辞的创译解构

#### 3.3.1 国民性自嘲的亲化和转化

自嘲式国民性书写通过调侃自身文化特质，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这种修辞策略以幽默的方式揭示文化中的矛盾与不足，既避免了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又增强了文本的亲合力，使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并理解异域文化。例如，通过“not bad-mannered toward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与“positively hostile toward his neighbour”的戏剧性对比，将国民性矛盾具象化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伦理”的断裂。以公共空间争夺战（电车、售票处）类行为自嘲，既凸显其荒诞性，又将文化特质降维为普适人性弱点。通过将特定国民性解构为人类通病，在自嘲中建构“不完美的我们”的共同体想象。这种策略既规避东方主义凝视，又以幽默为介质将文化批判转化为人性反思，使异质文化传播获得伦理缓冲与接受弹性。

#### 3.3.2 体制反讽的委婉呈现

体制反讽的软化处理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弱化批判性，使文化传播更具包容性与亲和力。这种修辞策略通过温和的表达方式化解敏感议题的潜在冲突，使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接受文化批判，同时增强文本的说服力。例如，林语堂运用“the beauty of our democracy”将制度缺陷伪装成体制优势，以赞美修辞包裹批判内核。“seeps back”的液态隐喻将腐败重构为民主系统的“自我净化”机制。其次，将贪污行为转化为代际伦理义务：“clear conscience”将公德缺失嫁接于私德正当性，“domestic problem”的递进表述将特殊体制问题升华为普遍人性困境。通过挪用家庭价值体系的共识性话语，使敏感的制度批判转化为跨文化可通约的生存智慧，在黑色幽默中完成对民主异化的隐性祛魅。此种策略通过挪用目标文化的核心价值符号进行自我解构，既规避文化本质主义陷阱，又以幽默为缓冲垫实现批判意图的隐形植入。

### 3.4 互文修辞的创译嫁接

#### 3.4.1 经典互文的跨文化嫁接

互文修辞通过并置引用不同文化的经典文本，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空间。道家经典与西方文化的互文性通过将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中的相似概念相联系，构建跨文化对话的空间。这种修辞策略不仅展示了文化的共通性，还使西方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从而增强文化传播的亲合力与说服力。

林语堂将《道德经》音译为“Tao Teh King”表达，保留源文化的异域特色。同时增补“The Bible of Taoism”，借《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性，为《道德经》赋予同等权威地位，实现文化资本的对等移植。这种“互文嫁接”不仅降低认知成本，更通过经典符号的并置，暗示中西文化在终极关怀上的相通性（如对道德与秩序的追求），从而提升传播深度。

### 3.4.2 历史典故的语境转码

历史典故的跨文化转码通过将中国文化中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对应物，实现意义的跨文化传递。不仅降低了文化传播的认知难度，还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理解陌生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说服力。

林语堂将韩非子“被迫仰药而死”的结局与苏格拉底“为法律殉道”的死亡并置，将中国法家的“以法治国”工具性逻辑与西方自然法的“法律神圣性”道德逻辑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认知框架。通过将韩非子与苏格拉底塑造为“东方与西方的法治殉道者”，既借助苏格拉底的符号意义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门槛，又以悲剧命运的镜像对照揭示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内核差异。这种策略呼应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通过同化将新信息纳入既有图式。

## 4 林语堂“创译一体”的动因

林语堂“创译一体”的实践并非孤立的翻译行为，而是其深厚的文化使命感、对传统翻译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特定时代语境下文化协商的产物。

首先，林语堂独特的生命轨迹赋予了他“两脚踏东西文化”的精神底色。作为出身闽南、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学者，他在清华执教期间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哺，构建起其“文化传真”的根基。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的“东方主义”偏见与误读，林语堂意识到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林纾式的自由发挥，这些传统的翻译理论都难以解决文化符号在跨语境转换中的失真问题。他敏锐地察觉到，“文本中心主义”的机械移植会导致西方读者因文化缺省而产生理解障碍。

因此，他在《浮生六记》与《吾国与吾民》等著作中，大胆打破“信”与“达”的二元对立，通过增补、注释及叙事节奏的重构，将东方美学与西方浪漫主义并置，使文化符号在跨语境中获得新生。这种“释译融合”的策略，实质上是在20世纪中叶中西交流的困境中进行的一场“文化协商”。

在“全盘西化”与“保守主义”的拉锯中，林语堂以“闲适哲学”为切口，将庄子的逍遥与梭罗的自然主义巧妙嫁接。他通过“创译一体”的路径，不仅绕开了意识形态的对峙，更在“去政治化”的叙事中重构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这种方式使中国经典不再是停滞的古籍，而是转化为西方读者可感知的现代生活哲学，从而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文化争取到了一个温润而坚定的传播空间。

## 5 创译一体的价值启示

林语堂的“创译一体”理论从根本上重构了翻译的本体论。“翻译即创作”主张译者应以目标语为土壤，让原作在异质文化中生根发芽。这一理念挑战了传统译论的“忠实观”，正如Bassnett&Lefevere（1990）所言，“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是权力关系的文学折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对《红楼梦》

的创造性转化即为明证：他舍弃了章回体的形式桎梏，以西方家族小说的叙事结构重构故事，同时保留“太虚幻境”等东方意象的诗性特质，使译本既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种“创造性叛逆”突破了 Venuti 的“异化、归化”二分法，在“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的张力中开辟第三条道路。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林语堂的创译实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多维镜鉴。其一，他的“读者中心”思想启示我们：文化外译需超越“自说自话”，如《吾国与吾民》通过“社会性书写”激活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这种“共情式传播”至今仍具生命力。其二，他的“文化转码”技术（如将“侠义”嫁接至西方骑士精神），为处理文化差异提供了方法——在保留文化本真性的同时，通过认知适配降低接受门槛。其三，他的“创译一体”模式对当代翻译教学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翻译

研究的未来在于打破学科壁垒，在实践中重构理论。林语堂的遗产提醒我们：文化传播的本质是“活的对话”，唯有在“忠实”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实现文明的真正互鉴。

## 6 结语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以修辞为媒介，用“创译一体”的方式打通了中国社会文化从“自说自话”到“被理解、被接受”的传播路径。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语境中对抗“东方主义”凝视的文化实践，更在于为当代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创造性翻译”的典范——即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目标文化的认知逻辑为“桥”，以修辞创新为“器”，实现异质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共生共融。这一模式启示我们，文化外译的本质不是“移植”而是“再生”。通过“创译一体”的主动建构，方能更好实现中国社会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深层跨越。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S.,&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0.
- [2] 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2nd ed.)[M].Bristol:Multilingual Matters,2001.
- [3] 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36:47,51,142,156,170,174,175,189.
- [4] 冯智强,庞秀成.宇宙文章中西合璧,英文著译浑然天成——林语堂“创译一体”的文章学解读[J].上海翻译,2019,(01):11-17+94.
- [5] 林太乙.林语堂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 [6]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黄嘉德,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47,51,142,156,174,175,170,189.
- [7] 戚宏波.林语堂:20世纪的“中国智慧”传播者[J].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145-152.